



周中因 原著

朱维铮 编校

中国经学史讲义

(外二种)

中国经学史讲义

(外二种)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经学史讲义:外二种/周予同原著;朱维铮
编校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2
ISBN 978-7-208-10776-2

I. ①中… II. ①周…②朱… III. ①经学-历史-
研究-中国 IV. 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9689 号

责任编辑 曹勇庆
封面设计 储平
技术编辑 伍贻晴

中国经学史讲义(外二种)

周予同 原著 朱维铮 编校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2.5 插页 2 字数 182,000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250

ISBN 978-7-208-10776-2/·K1890

定价 25.00 元

编校说明

朱维铮

本册辑入周予同先生的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、《中国学校制度》两种史著，以及朱维铮论述周先生学术生涯的专文《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》。

早在一九二八年，年方“而立”的周予同先生，便发愿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，而第一个愿望，就是：“我将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较详密而扼要的《经学通史》，使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，明晰地系统地呈现于读者。”

然而，直到周先生年近花甲，他的这一夙愿，才似乎出现化作实践的可能。因为一九五六年政府搞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，其中承认中国经学史属于史学的分支学科，而由周先生草拟的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案，就首列要组织专家编著一部中国经学通史。岂知环境很快骤变，“百家争鸣”化作梦幻，接着是“史学革命”，便有某些老少好汉，指斥周先生提倡经学史研究，乃迷恋“封建学”。

当然周先生不为所动。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的荒诞剧进入尾声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，周先生就为新成立的中国古代史专门化，开设中国经学史。这是当年全国大学文科独一无二的课程。

在“五四”以后，新史学家研究经学史而与周予同先生相颉颃的有范文澜。范文澜的成名作《群经概论》，得到周先生与顾颉刚等结成的朴社支持，于一九三三年继周先生的同名著作在北平出版，二书遂以各自倾向经今古文学，而在南北互相辉映。时间表明，范著效应逊与周著。但范氏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便赴延安，学习马列理论，致身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，甚受毛泽东推重，一九四〇年他在延安新哲学会发表系列演讲，批判传统经学。毛泽东得到他的讲演提纲，致函赞美：

提纲读了，十分高兴，倘能写出来，必有大益，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，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，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。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，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。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，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？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？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，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。

以上录自《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》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《毛泽东文集》，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3，页296；又见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3，页163，二书俱注“根据手稿刊印”）。于是范文澜一九四一年初在延安《中国文化》二卷二三期连载《中国经学史的演变》，以后改题《山穷水尽的经学——鸦片战争以后》（收入范文澜史学论文选集）。

自从汉武帝“表彰六经”以后，学者无不称作儒者，号称致用的种种政经文史学说，也无不比附儒学。周先生的经学史研究，一大特色便是区别经、经学和经学史，指出三者各有时地人事的界定，不可混淆。他特别重视经学历史的形态变异，总在勾稽经学流派史的内涵外延，致使读者常误以为他赋予学术继承性以过大的注意。但周先生表明，他的经学史研究，出发点是求实，十分重视述史信而有征，归宿是求真，十分重视结论征而后信。

因此，周予同先生在举国声讨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高潮中开讲中国经学史，压力是多么的沉重。单是前揭点名声讨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炳麟、胡适，以及著《今古学考》的廖平，号称“只手打孔家店”的吴虞，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当作劣绅处决的杰出文献学家叶德辉，就使“近代”经学史只能被描绘得一团漆黑。

因而周予同先生就似乎不够明智，论及康梁章胡乃至廖吴叶等，总是先说彼辈否定传统经学的历史贡献，再批评彼辈的“错误一面”。

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，周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，给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四五年级学生，讲授中国经学史，每遍学制一年，每周四学时。当时周先生已年逾六旬，令我辈感动的，还不是先生频频吞药而讲授不辍，尤在于不曲学阿世，时时直称某些主流史家反历史。

当时周先生已任新《辞海》经学史分科主编，借征求海内学者意见的机会，作文申述自己的主张。诸如《“经”、“经学”、经学史》，《关于中国经学

史中的学派问题》，《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》，《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》，《章学诚“六经皆史说”初探》，《博士制度与秦汉政治》，《从顾炎武到章炳麟》，凡七篇，于沪京报刊密集发表，引起学界惊异，纷纷打听周先生在复旦讲授经学史的情形。

但周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刊布的经学史论文，时给人欲言又止的印象，毛病出在人文学科的生态环境日趋紧蹙。这时周先生还任全国人大代表。记得一九六三年他赴京开会归来，我前往送稿，发现他异常郁悒，候之良久，才闻他长叹：“怎么存天理灭人欲，又回来了？”不待说这是对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回应。

周先生做学问从不肯依违调和，他每在课堂上对极左思潮进行批评，过后自称“走火”，但学生们，都认作那是真话。当然说真话，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周先生为非罪遭冤的吴晗，说了几句真话，无非说吴晗是清官，是好人，决不会反对三面红旗，便成为上海头号牛鬼蛇神。当然周先生不仅因替吴晗辩护才遭难，他从反对姚文元批《海瑞罢官》文章是“乱箭齐发”，回顾历次政治运动都拿历史学开刀，说是以后中国人要学习中国史，只能到外国去学了。这恰好触到极左思潮的痛处。他又公然反对讲历史以今律古，扭曲历史真相，辩护在实践中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所谓正确路线，怎不招忌？

当年周先生讲授中国经学史，导论绝不重复，专题也畸轻畸重。可惜我的笔记，遭红卫兵夜袭抄家取走，已不知去向。因而，当我得知一九六二年留作周先生研究生的许道勋教授，尚存当年周先生的讲课笔记并已作整理，于是请他再作修订，收入拙编先师选集的增订本。

许道勋先生整理的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，所记讲授内容主要是在一九六二年弥漫海内以后。周先生已不能昌言无忌，但仍属周先生晚年建构经学史学科的唯一系统记录，劫后遗珍，弥足宝贵。

本册辑入的《中国学校制度》，作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，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“国学小丛书”之一，于一九三三年刊行初版。当初原拟收入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。后来我把它抽出，是因为想继编一部周先生的教育学和教育史的论著集，准备将这书和周先生另一部名著《中国现代教育史》，同列其中。设想没有实现，原因不去说它，但我始终以为不看这书，就很难了解周先生的中国经学史体系的全豹。

为什么？我已介绍，周先生早年主要从事教育研究，尤其关注自古及今的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。正是由教育史的研究，使他发现传统教育自汉以来总在经学诸形态的笼罩之中，而经学的幽灵也正是民国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作祟力量。于是周先生决意从历史角度清算经学。由周先生的著作史可知，他在三十以后的学术研究，特色就是经学史和教育史双轨并进。

《中国学校制度》，如周先生自述，应该称为“中国学校制度沿革史”。教育的涵义非常广泛。而周先生将历史陈述的重心，置于中国形式的学校产生以后的演化过程和不同时期制度结构，所谓“掌握于支配阶级，而成为统治组织的一种部门”纵剖面 and 横断面。

周先生毫不讳言著书的旨趣，在于校正当时流行的三种谬见，即教育独立论、教育复古论和“三代为中国黄金时代论”。这当然不是空论，通读全书的简明历史陈述，就知道那些谬见的古今由来。

一瞥本书的四编目次，便给人详近略古的印象，表明作者注目的焦点，在于教育的“现代化”，在于晚清到民初的新式学制如何克服官方经学的羁绊而艰难地形成。有趣的是全书终章题作“国民党党治下的学校制度”。那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上距本书写作不过四年，还没有实现名义上的“党统”。周先生称其统治为“党治”，称其颁布的教育宗旨、教育方针和学校内容，为“党治下的学校制度”，是实事求是的，却需要学术勇气。终章的写法，也与以前不同，似为白描，可是每述一事必注国民党官方文件的出处。反证国民党专政伊始，已迫使正直的学者要如实陈述当代教育史，必须提防“党治”的报复。倘说“以史为鉴”，这不也是“殷鉴不远”的一个实例么？

本册最后一篇，《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》，是我的一篇旧作。初刊于《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一九八〇年四期，后从先生同学老友周谷城教授之命，稍事修改，作为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的后记。我原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定，务必尽快印行拙编《选集》，呈献给卧病已十多年的周先生。不料随即陷入场场诬告官司，待我为先生雪谤，这部选集已由“生著”变成“遗著”。但我至今以为这篇旧作还有一读的价值，因为其中介绍周先生早就指出我们民族富有“进取精神”，我们的学界的希望也在未来。

2007年7月10夜分

目 录

中国经学史讲义	1
上编 导论	1
第一章 研究经学史的目的与方法	1
第二章 经学史参考书目举要	2
一 理论指导	2
二 群经通论	2
三 经学历史:通史类、断代史类	3
四 经学史料:传记类、目录类、文物制度类	5
第三章 经的定义	8
一 从字源学来看“经”的意义	8
二 从文献学来看“经”的意义	8
三 “五常说”、“专名说”、“通名说”、“文言说”	9
四 经的几个特点	10
第四章 经的范围及领域	10
一 六经	10
二 五经与“乐”之有无问题	12
三 七经	13
四 九经与十二经	13
五 十三经	15
六 十四经与二十一经	15
第五章 经学的学派	15
一 经学及其派别综述	15
二 两派说	18
三 三派说	18
四 四派说	19
五 新三派说	20

第六章 经学史的分期	21
一 经学史的开端问题	21
二 四期说	22
三 六期说	22
四 十期说之一	23
五 十期说之二	25
六 二期三世说	26
中编 经学史诸专题	28
第一章 孔子与墨子	28
一 儒、儒家、儒教	28
二 孔子与经学的开端	28
三 墨子与经典的关系	29
第二章 孟子与荀子	30
一 “儒分为八”	30
二 孟子与经学	30
三 荀子与经典传教	31
第三章 董仲舒与刘歆	31
一 董仲舒与今文经学	31
二 刘歆与古文经学	33
第四章 东汉经学	34
一 《白虎通》的研究	34
二 许慎之学	34
三 郑玄的“通学”	35
第五章 玄学与儒学	36
一 “玄”之含义与玄学研究	36
二 王弼与何晏	36
三 阮籍与嵇康	37
四 裴頠与郭象	38
五 晋代《春秋》学的新“集解”	38
第六章 汉学与宋学	39
一 汉学与宋学的区别	39
二 宋学的萌芽：唐朝后期《春秋》学	40
三 宋学的正式开始	40

四 宋学学派:程朱学派、陆王学派、浙东学派	41
五 宋学的优缺点及其对清代“汉学”的影响	42
第七章 清学	43
一 “清学”之名及其研究书目	43
二 清学的启蒙期	43
三 清学的全盛期:乾嘉学派(吴派、皖派)	45
四 清学后期:以常州学派为中心	47
第八章 康有为与章太炎	49
一 康有为的经说	49
二 章太炎的经学成就	50
下编 经典研究	50
第一章 《易》学	50
一 《易》之构成及其作者	50
二 《易》学学派:汉学与宋学	52
三 清代《易》学研究	53
第二章 《书》学与《诗》学	54
一 《书》学的辨伪	54
二 《诗》学的研究	54
第三章 “三礼”学与《春秋》学	55
一 “三礼”学的研究	55
二 《春秋》与孔子的关系	56
三 《春秋》三传的研究	57
第四章 《论语》学与《孟子》学	57
一 《论语》的传本问题	57
二 《论语》学的研究	58
三 《孟子》的作者与“升格”问题	59
四 《孟子》的研究与批判问题	60
第五章 “四书”学	61
一 “四书”的建立及它的发展	61
二 《大学》与方法论	62
三 《中庸》与本体论	63
四 “四书”集结与道统理论	63
第六章 《孝经》学与《尔雅》学	64

一 《孝经》升格及传本	64
二 《孝经》作者与学派	65
三 《尔雅》学的研究	65
中国学校制度	72
绪言	72
本书的领域	72
本书的分期	73
本书的旨趣	75
上古编	76
一 传说中的西周以前的学制	76
学校制度的萌芽	76
传说中的虞夏商三朝的学校制度	76
双轨制下的学校内容	77
二 礼记周礼所传的西周的学制	78
本期史料考订的难点	78
国学与乡学	78
教官与教科	79
学龄与学则	80
三 春秋战国时代的私学	82
史料的缺乏	82
私学的繁兴	82
中古编	84
一 秦代的“吏师”制度与博士	84
吏师制度的创立	84
吏师制度创立的因素	85
吏师与博士	86
二 两汉的经典教育与学校	86
经典教育的突兴	86
两汉学校的系统与种类	87
太学的创立与演变	88
太学与博士	88
太学与太学生	89

郡国学校的起源与发展	90
两汉的特殊学校	91
学校与选举	92
三 魏晋时代学校制度的衰败	93
学校制度衰败的因素	93
三国时代的官学与私学	93
两晋时代的太学与国子学	94
五胡十六国学制拾零	95
四 南北朝的学校制度	96
南北朝之文化的差异	96
南朝的国学与州郡学	96
北朝的国学与州郡学	97
私学的重兴	99
近代编	99
一 科举制度下的隋唐学制	99
唐代学制的先驱者	99
唐代学校的体系与种类	99
学校制度的阶级性	101
学校科目的扩张	101
学校规程的厘订	102
学官与学额	103
外国留学生的发达	106
学校与科举	106
五代时期学校的衰落	107
二 两宋的学校与书院	108
宋代学制的改进	108
宋代的京都学	109
宋代的州县学	111
书院制度的起源与发展	113
禅林制度的追述	115
三 异族统治下的辽金元学校	116
辽的学校制度	116
金的学校制度与其特点	116
元的中央学校与地方学校	118

元代学校的发达及其原因	120
四 明代的学校制度	121
明代的中央学校	121
明代的中央学校	122
明代的特殊学校	123
明代学制的特点	124
明代学校之政治的效能	126
五 清代初中叶的学制	127
清代的中央学校	127
清代的中央学校	128
清代的特殊学校	129
现代编	130
一 新式学校的萌芽	130
现代学制产生的因素	130
实用中心之各种学校	132
留学制度的发创	134
二 新式学制的产生	134
本时期之三期划分	134
戊戌维新之学制一瞥	135
钦定学堂章程下之学制	135
奏定学堂章程下之学制	138
这一时期的其他兴革	140
改订学堂章程下之学制	142
三 民国新学制的颁布与修正	142
民国学制的产生与颁布	142
民四以后的学制修正	145
学校系统改革案的产生与颁布	146
新学制课程标准的制定	148
四 国民党治下的学校制度	149
党治下教育主张之演变	149
党治下学校内容之兴革	150

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

——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后记

朱维铮 153

中国经学史讲义*

上编 导 论

第一章 研究经学史的目的与方法

我们是从史的角度来研究经学,而不是从原来的经学上去研究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经学史,这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。

第一,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,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第二,阐明经学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,正确地认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。如“春秋大义”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很大,这个问题却是目前中国史研究中薄弱的环节。

第三,正确地估计经学与中国文化史的关系,以及经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。经学史是文化史的缺口。封建经学家以经学概括一切领域,而我们则把经学置于学术思想史之中,又将学术思想置于文化史之中。

经学与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关系较大,不懂经学而要研究这两门学问,往往会出问题。目前有些著作存在问题,往往因为中国文献学的底子不厚,而经学是文献学中的最基本部分。我们学校文科教学中,文化史是不足的,讲授经学史可以弥补这个缺陷。

孔子、董仲舒、朱熹,可说是中国旧文化中的重要人物,而他们三位与中国经学关系较大。当前历史研究存在的问题,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研究得很不够。古代经学,实在是讲政治思想的。如东汉何休的《公羊解诂》,形式上是章句之学,实际上是讲何休的政治思想。清代戴震

* 周予同讲授,许道勋笔记整理。

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也是讲哲学的，以经学为基础而谈政治哲学。因此，怎样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讲明白，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。

我们是“超经学”派，先要跳进去，还要跳得出来。

第二章 经学史参考书目举要

一 理论指导

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：《论哲学史》，科学出版社，一九五九年出版。

毛泽东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。

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二 群经通论

皮锡瑞：《经学通论》，师伏堂原刻本，商务印书馆铅印本〔一〕。

皮锡瑞，字鹿门，湖南善化人。他是今文学派，与谭嗣同是友人，曾被清政府拘禁过。他跟王先谦也是同学，但在政治上是对立的。他赞成变法维新，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，创办湖南高等学堂和师范学校。敬仰西汉《尚书》今文学大师伏生，将书斋名曰“师伏堂”。《经学通论》又称为《五经通论》，即《易经》通论一卷、《书经》通论一卷、《诗经》通论一卷、《三礼》通论一卷、《春秋》通论一卷。此书犹如今天大学里的专题讲座，每经一卷，每卷论述若干专题。《五经通论》内容是较深的，但还要研究，读一读，从前没有人用经学学派的观点来评论《诗经》，由此书而开始了新的研究途径。但是，皮锡瑞钻进经学，却不能跳出来，所以他是二流人物，不像康有为、章太炎那样多少跳出来一些，其影响不如康氏、章氏。

范文澜：《群经概论》，朴社，一九三三年出版。

朴社，是由我们（顾颉刚、周予同等）组成的。范文澜的《群经概论》是在学校里讲课用的，它比较详细，但比较乱。解放后不愿重印。范老以前提出“山穷水尽的经学——鸦片战争以后”〔二〕，反映了他的观点。而我认为经学已成为历史的材料了，经学是文化史的一部分。

周予同：《群经概论》，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出版〔三〕。

我的经学知识，从钱玄同那里接受了一些。解放以后，出版社要我改写重印，但我没有时间修订。

我的《群经概论》出版很早，简明扼要，适宜于初学者。当时我在商务

印书馆工作,白天编辑《教育杂志》,晚上搞这本小册子,编辑工作对于做学问大有益处。

周予同:《经今古文学》,商务印书馆,“国学小丛书”本,一九二六年出版,一九三三年重印。列入商务印书馆“万有文库”。解放后作了一些修改,一九五五年由中华书局重印〔四〕。

附,江藩:《经解入门》,小字石印本。

江藩是清代汉学吴派学者,惠栋的再传弟子。根据顾颉刚的意见,《经解入门》实际上是缪荃荪编撰的,供初学者使用。缪氏是版本目录学家。

以上是经学基础知识,属于“五经总义”。西汉大多专研一经,东汉以后才有“通经”的,如《白虎通》及许慎《五经异义》等。群经通论性的专著,始自东汉末郑玄《六艺论》(已佚,仅有辑本)。

三 经学历史:通史类、断代史类

皮锡瑞:《经学历史》,师伏堂刊本,商务印书馆铅印本。周予同注释重印本,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。

至今没有一部严整而系统的经学通史。皮氏的《经学历史》还是有一读的价值。他是用会通的眼光来写中国经学史的第一人,今天我们更要从史学的观点来研究经学,不可以经学来搞经学,通与专,互有关系,不可把两者对立起来。

近人刘师培:《经学教科书》第一册,国粹学报社本,刘申叔遗书本〔五〕。

刘师培,字申叔,号左龢,江苏仪征人。“师培”的意思,是师事于汉初《诗经》学大师申培公。曾祖父刘文淇,是清代汉学的专门家。刘师培后来倾向革命,改名“光汉”。还留学日本,成为同盟会会员。回国后,却投靠清政府权贵大臣端方。袁世凯复辟帝制时,他又是筹安会“六君子”之一。因此,在政治上名声不好。死时仅三十六岁。但刘师培的学问渊博,著作很多。《经学教科书》第一册讲经学历史,第二册论述《易经》,在经学观点上是属于古文学派。把第一册(油印发给大家)跟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(属于今文学派观点),对照起来读,还是有价值的,可以了解今古文学两派的不同意见。

今人马宗霍:《中国经学史》,商务印书馆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本。

马先生是章太炎的后期学生,搞古文字学。他的这本书可作一般阅

读参考,观点比较平稳。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中有好的,也有差的。如《中国理学史》的作者,根本不懂中国文化。马先生的《中国经学史》还算是可以的,比较容易懂。

日本学者本田成之:《经学史论》,商务印书馆“国学小丛书”本,一九三四年出版。

这本书原名《支那经学史论》,江侠庵译。作者站在史的观点上,按朝代顺序,讲述秦汉、后汉、三国六朝、唐宋元明、清朝(清初、乾嘉时代、道咸以后)的经学。资料尚丰富,但结论不高明。

以上是通史类。至于断代史类,则以两汉与清代经学史最为重要。

近人康有为: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,万木草堂刊本,古籍书店排印本。

康有为是今文学派,称孔子是“托古改制”,认为“托古”是宣传的方法,“重言”而已,目的是“改制”。所谓“孔子改制考”,实际上也是“先秦诸子改制考”。康有为要解决儒经与儒家的关系问题,说孔子定六经是为政治服务。康有为有才华,而他的书中观点是“偏”的,今文学派往往有“狂妄”。人总有些“偏”的,郭老^[六]也是如此。但“太偏”了,就不容易搞出学问。

《新学伪经考》是讲汉代经学,观点也很偏,但了解其所属的学派,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。所谓“新”,是指王莽的新朝。“新学”即古文经学,康有为说“古文学”是假的东西,是西汉末刘歆伪造出的。古籍书店本较好,后面有钱玄同的一篇文章《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——重印新学伪经考序》(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)。这篇代序值得一读。

附,唐晏:《两汉三国学案》,朝阳郑氏刻本^[七]。这部书把正史中有关经学家的资料汇编起来,是不太好的资料书;可看可不看。

以上是讲从孔子到两汉经学史的著作。经学的开始与孔子有关,有了孔子、儒家、儒教(汉武以后),才有经典。两汉是经学得以稳定与巩固的时代,当时经学家往往也是政治家,以经学服务于政治。魏晋南北朝不仅是“乱世”而已,而是变动的时代。在门阀制度下,讲孝不讲忠,经学不发展,玄学却兴盛。清代汉学家对魏晋学十分痛恨,章太炎则很重视,鲁迅也很重视,例如研究嵇康。宋、元、明主要是理学、道学,这是儒、道、佛混合的东西。《宋元学案》和《明儒学案》,对于研究思想史哲学史还可以用,但搞经学史是不够用的。总之,自魏晋至明朝,断代经学史著作几乎是空白的,